

抗战后期路易士在上海的文学活动

李相银

提 要：抗战后期回到上海的路易士，得到了《中华副刊》主编杨之华和汪伪高官胡兰成的大力支持，得以回归诗人身份，相对稳定的生活和良好的创作环境促成了其创作高峰的到来。1930年代短期的留日经历，带给路易士最直接的日本体验，翻译、评论与创作有关日本作家的文字，成为此时路易士与在沪日人交往的基本手段。《诗领土》创刊后，路易士发起关于“新诗的厄运”和“市侩文化”的论争以及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表达他的纯文学立场与精英文化意识。路易士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投机主义者，在善加利用政治当局文艺政策的同时，也会坚持自己的文学判断与立场。

关键词：抗战后期；路易士；文学活动

Loui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Anti-Japanese War

Li Xiangyin

Abstract: Louis returned to Shanghai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Zhihua Yang, chief editor of Chinese Supplement, and Lancheng Hu, a senior official of Wang Jingwei Reorganized National Government, he was able to return to his status as a poet. The relatively stable life and good creation environment contributed to the arrival of his creation peak. The short-term experience of staying in Japan in the 1930s brought Louis the most direct experience of Japan. Translating, commenting and writing about Japanese writers became the basic means for Louis to communicate with Japanese people in Shanghai at this time.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Poetry, Louis initiated debates on "the Doom of New Poetry" and "Philistine Culture" and criticized "Left-wing Literature" to express his pure literary stand and elit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ui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Shanghai show that he was a typical cultural opportunist, who insisted on his own literary judgment and stand while making good use of the literary policies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Key words: Late Anti-Japanese War; Louis; Literary Activities

关于路易士与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的关系，陈青生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万华在《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都略有提及，主要着眼于路易士创办诗领土社的意义，并对其诗作进行简要述评。台湾学者杨佳娴在专著《悬崖上的花园——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上海文学场域（1942-1945）》（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中，设有“守住现代派的位置：《路易士与〈诗领土〉》”一节，其中“《诗领土》与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文坛”部分，重点讨论了路易士的诗论以及汉奸问题，基本未涉及路易士创办《诗领土》之外的文学活动。李相银在专著《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研究（1942-194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中辟有专章《上海沦陷时期的诗人路易士》，以《中华副刊》为切入点，对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行迹进行了细密考证，并深入探讨了路易士对上海沦陷时期诗歌的意义与影响。

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路易士在此间的文学活动，进一步探究其成为抗战后期上海“诗坛上坐第一把交椅”^[1]的诗人的主要原因，并透过其发动的文学论争与批评，管窥其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

一、与杨之华、胡兰成的遇合

1942年8月，路易士从香港返回上海，先是暂住在内兄胡金人家，后租住在一个小亭子间，“生活异常艰苦，全靠亲友接济。”^[2]就在路易士一筹莫展之际，贵人杨之华适时而至，多年后的《纪弦回忆录》写到：

就在我刚回上海的第三天，杨

之华就由我二弟路迈陪同，前来胡家访问我了。……他笔名杨桦，写小说与散文，现任“汪派”报纸《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路迈和他同事，编新闻，常用笔名鲁宾或鱼贝发表短篇小说，颇受读者欢迎。……鲁宾和杨桦很要好，听说我快要回来了，他们早就商定，要请我为《华副》写稿。于是经介绍、客套一番之后，就言归正传了。当然，我点了头。^[3]

如路易士所述，回到上海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难关。经其弟路迈介绍，路易士得以结识汪伪政府机关报《中华日报》副刊主编杨之华。卖文是此时最好的求生之道，故而明知对方的政治属性，路易士心中亦无芥蒂，他能认同弟弟路迈在《中华日报》编新闻，说明他并不反感在“汪派”报纸上发文章，况且杨之华是主动索稿而来，而非自己主动投靠。不容忽视的是，在路易士回归诗人之路上，杨之华是伯乐，也是重要牵引者，为穷困中的路易士提供生机，带给他资源和平台，并最终成就了路易士。

当然，杨之华并非等闲之辈，此时的他已是“中华系中最吃香的一员”。^[4]《中华副刊》于1942年6月22日创刊，至1945年8月21日终刊，共出693期，杨之华一直担任主编，其与《中华日报》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事实上，杨之华不仅仅是个编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文学史料专家和文艺思潮研究专家，曾于1944年先后出版《文坛史料》《文艺论丛》两部著作。路易士认为杨之华对抗战后期上海的纯文艺活动“大有贡献，功不可没。”^[5]有着深厚文艺功底的杨之华于用人之际慧眼拾得路易士的可塑性，而路易士对杨之华也惺惺相惜：

杨之华对艺术的看法和主张，大体上和我相同：尊重文艺作家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干预文艺。……因此，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从此以后，我经常有诗和散文发表于《华副》，而我返沪后大多数的文艺活动，遂与杨之华不可分。^[6]

相似的文艺观让路易士和杨之华越走越近，直至成为知交。对诗人路易士而言，他与杨之华的遇合恰逢其时，获益良多，不仅由此得到了进入上海文坛的第一个据点《中华副刊》（简称《华副》），还在杨之华的力捧之下成为《中华副刊》的台柱作家，迎来其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巅峰时期，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路易士在经济上对汪伪政府有着很强的依附性，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他虽然没有堕落到“有奶便是娘”的地步，但显然未曾反思过自己的选择是否正当。

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士于1942年8月25日结识杨之华并答应为《华副》写稿，但直至第56期（1942年9月28日）其作才在《华副》上出现，原因何在？原来他专程去了一趟南京，随后病倒数日。^[7]“没有死，还能够工作。我是很快乐的。工作使我快乐。我将努力工作。……在这一个月內，我写了三首诗。诗是久不写了，现在居然又写出来，在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安慰。”^[8]显然，在教书、编报、编杂志暂不可得的情况下，诗歌创作成为重返上海的路易士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如果不是杨之华登门约稿，诗人路易士的回归或许尚待时日，也或许抗战后期的上海滩不会出现这位诗人，而只会多一位默默无闻的教书匠。

《滞沪诗钞》是路易士献给《中华

副刊》的第一组诗作，其中的《归来吟》充分表达了他平安回到上海的兴奋之情：

“海水由浓绿而浅绿而淡黄而深黄了。/我是冒着海涛的惊险/与夫虎列拉之袭击而归来的呀。//南京路无恙，霞飞路无恙，条条马路无恙。/国际饭店无恙，大光明无恙。/众力公司无恙，幢幢建筑物无恙。/回力球无恙，赛马无恙，夜生活无恙。/朋友无恙，家人无恙。//像三岁小儿一般雀跃着，/当我重又投进这不朽都市的慈怀，/因为我流浪得够了。”^[9]诗人用劫后余生的喜悦心情看眼前上海，不惜以近乎饶舌的方式带着读者巡行上海的马路、饭店、戏院、公司、赌博、赛马、夜生活与亲朋，且统统以“无恙”为惊喜安慰与结束。在上海与香港之间，路易士显然将上海当作故人故地，香港之战对路易士的上海观产生了一瞬之间的强烈冲击，以至于上海暂时获得“不朽”与“慈母”的赞美。《归来吟》在路易士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并不算很有水准之作，其后也未被路氏收入诗集，但路易士却通过这首诗宣告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归来。

路易士的另一贵人是胡兰成。“25日，以事赴京。27日，事毕返沪。”^[10]上文提到，回到上海后的路易士曾去过一趟南京，专程拜访胡兰成。1939年路易士刚到香港时，经好友杜衡介绍结识了胡兰成，两人算是旧识。胡兰成故人情深，知道路易士生活窘迫，打算安排他到汪伪行政院法制局做秘书，却被路易士婉拒：

那种“秘书”工作，我根本不会做，公文呈式，等因奉此，我是一窍不通，而且我的毛笔字也写不好，所以我就婉言谢绝，没有成为他的“属下”，不拿他的“薪水”了。他很尊重我的决定，并未加以强留。只谈文艺，不涉政

治，我在他位于南京高级住宅区石婆婆巷的“公馆”里住了几天之后，就又回上海了。^[11]

多年后，路易士以“生当乱世，保持我的清白，这比一切重要”^[12]的说辞为自己向胡兰成求职开脱，只能说是事后狡辩，不能太当真。但他与胡兰成约定“只谈文艺，不涉政治”，却并非不可能。路易士与胡兰成本就是文字之交，之所以到胡兰成处找门路，除了胡兰成有职有权外，胡兰成的才学也令路易士叹服：“他学贯中西，从传统到现代，肚子里的墨水够多。对于五四以来的新诗新文学，他也有他的看法。……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强大的批评才能。”^[13]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则是胡兰成与自己有着相同的文艺观，深受杜衡影响的路易士终身以“反共、反左，保卫文艺自由，不许政治干预文艺”^[14]为目标，他显然在胡兰成身上找到了一致性。在路易士的认知中，与汪伪官员交往、在汪伪官报上发文章、参加汪伪政府组织的文艺活动，都无关政治，只要不在汪伪政府任职，不拿汪伪政府薪水，就是政治清白之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底线他并未能坚守住，他很快就在胡兰成的安排下出任伪政府的一些闲职了。

虽然，《纪弦回忆录》中对此只字不提，但人过留痕，当年刊发于《中华副刊》的文字留有记录：“从去年八月里我自香港归来以迄于今年春间，的确是曾经在南京和泰县二个地方做过两次的官了。”^[15]至于路易士在南京和泰县具体任何职？有资料揭露路易士在苏北兼职甚多，主要职务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长”，^[16]台湾学者刘正忠认为此说不值得采信，因为“以文人背景出任上校军职，不甚合理。”^[17]然而据

瘦秋《苏北文化参访团扬纪》一文记载，苏北文化参访团团员中有路易士的名字，头衔为“苏北行营上校秘书”。^[18]该文为新闻特写，且刊于1943年的汪伪政府机关报，说法应该比较准确。

对路易士而言，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显然他在宁泰两地为官并未达成此目的。作为一位为领导服务的低阶官员，路易士每天需要面对大量庸俗的人和事：“只有抽雪茄的大腹便贾。/只有商业上的宣传文广告画。/只有阿谀权贵的文化人。/做他升官发财的梦！”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显然挑战了他作为一位诗人的良知，他并不愿意就此沦为官方的吹鼓手：

“我是诗人，/所以难吹愚妄的喇叭。”对于这个没有文化的世间，路易士感到绝望，连用九个“没有文化”来表达诗人的愤怒：“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光。/没有希望。”^[19]令他更为绝望的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几乎剥夺了他的思考时间和写作空间，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写作场所。/没有书桌和书架。/没有家。//没有闲暇和余裕。/没有创造。/没有沉思的生涯。/没有心的平安和灵魂的午睡。”^[20]因此，他开始发出灵魂的呐喊：“给我以生存空间，/写作场所，/书桌和书架，/创造之必要条件的闲暇和余裕！/给我！给我！给我！”^[21]做官意味着必须向文学告别，这是路易士始料未及的。

《向文学告别》一诗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与郭沫若的《天狗》颇为相似，诗人感情充沛、率真坦诚、直抒胸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该诗写于1943年8月，路易士辞官之后。诗作发表之后引来多方关切，于是而有《关于〈向文学告别

>》一文。在该文中，路易士自揭谜底，详细交代了在南京和泰县做官的情形：“人家给我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我则每日按时上班下班，签到签退，做纪念周，俨然一官。……但我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句等因奉此，这便是说，我从来没有办公。……办公厅，实际上成为我的写作场所了。”^[22]如此的无为而治和不务正业，连路易士自己都觉得滑稽，但既是求了人情（即胡兰成）才得到的职位，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待发现“做官所得薪俸也实在养不活老婆与孩子们，倒不如一千字一千字地写点文章卖卖赚得多些”^[23]时，路易士终于决定挂靴而去。上述文字表明，生存焦虑一直是上海沦陷时期的路易士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当他将个人和家庭的生存问题视为人生第一要义时，所谓的民族气节已无足轻重。

辞官之后的路易士曾在《中华日报》短暂任职，有资料指出路易士在得到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的赏识后，“荣任《中华日报》的主笔。”^[24]考察路易士的人生行程，其回沪之后不久便有宁、秦为官以及返乡之举，直到1943年6月20日方才重返上海。因此，他任职《中华日报》当是在此之后，而诗人南星得到路氏去职的消息则在1944年4月之前。可见，路氏在《中华日报》任职不到10个月。《中华日报》主笔的收入应该是可观的：“诗鱼的生活从此阔绰起来，不是领导一群《诗领土》的领民到新雅座谈，便是到甜甜斯喝咖啡。让一位爱好诗鱼的大作的女士倚到怀中听他朗诵杰作，再不然，就是到北四川路一间叫做潮的酒吧去，跟所谓盟邦的诗友池田克己他们讨论大东亚文学。”^[25]至于路易士又为何离开《中华日报》，则可能与创办《诗领土》（1944年3月创刊）

后事务繁忙有关。

在杨之华和胡兰成的帮助下，路易士获得了诸多机遇，虽然他仍有牢骚满腹，但已不用再为衣食犯愁，相对稳定的生活和良好的创作环境直接促成了其创作高峰的到来。1944年是路易士诗作产量最丰富的一年，共创作诗歌80余首。除了出版发行五期《诗领土》外，路易士还自费印刷了两部诗集《三十前集》《夏天》，并由太平书局出版了诗集《出发》（1944年5月）。

二、日本经验及其利用

路易士曾于1936年4月去日本读书，6月归国，虽然时间不长，却带给他最直观的日本认知和最直接的日本体验，并在上海沦陷时期上幻化出多种呈现方式，其中，翻译、评论以及创作有关日本作家的文字是基本手段。

首先，路易士热衷于通过日语转译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崛口大学翻译的诗集《月下之一群》《槟榔树》为他打开了观望、揣摩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通道。《月下之一群》收有66位法国近代诗人的340首诗，而《槟榔树》则收入了梵乐希、里尔克等24位诗人的65首诗。路易士宣称自己忠实于日文：“第一书房版崛口大学译诗集《月下的一群》，是我的数部随身的爱书之一部。……这里我所译的几位法国诗人的诗作品，便是据《月下的一群》而重译了的。因而，我只能忠实于崛口大学的日译，而不能对原作负责，如果有了什么错误的话。”^[26]经过转译而发表于《中华副刊》的法语诗作，有匹加比芦的《黑奴》、阿保里奈尔的《蚤》《69》《动物诗》、贾克巴龙的《人生万岁》

等。其中，阿保里奈尔是路易士膜拜的对象，其《斥盲》一文便是因《69》被人误读而作。

其次，对日本诗歌和文论的翻译与推介。《中华副刊》曾于第331-335期组织“日本现代文学专号”，其中有多篇译诗出自路易士之手，如《远远的蔷薇》（岷口大学作）、《蔷薇》（西条八十作）、《诗人》（野口米次郎作）、《对于太空之思慕》（福田正夫作）等，每一首诗之后都附略诗人年谱（年表）予以郑重推介。此后，路易士又陆续翻译了诗歌《太阳出现》（与谢野晶子，第340期，1943年11月14日）、《指》《玩具的船》（西条八十，第363期，1943年12月25日）、《空间》《富士山》（草野心平，第416期，1944年4月22日）、《南风疾走》（朝岛雨之助，第442期，1944年6月9日）等。发表于《诗领土》的译诗则有《望乡》（黑木清次作，第2期，1944年4月）、《草野抄：关于、睡着》（草野心平作，第3期，1944年6月）、《防空装》（池田克己作，第3期，1944年6月）等。

《满洲文学》是路易士刊在《中华副刊》上的第一篇翻译文章。该文为大内隆雄所作，专就满洲文学中“日系的”文学而论。所谓“日系的”文学，乃专指住在满洲的日本人用日语写作发表的文学而言。该文一方面要为满洲文学写真，表现出文学史的意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战时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试图强化殖民主的文学在满洲的地位，将之建设为满洲文学的主体。^[27]路易士对阐述殖民强权意识的文字视而不见，其民族观念之淡漠可见一斑。

《诗领土》创刊号上即有路易士翻译的诗论《诗的世界》，该文与《表现与

技巧》（第2期）、《在于世界之中的诗（上）》（第5期）均译自工藤好美的专著《诗学》。工藤好美是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其所谓“诗乃经验之完成，诗的世界乃吾人于其作完全的经验的世界”，^[28]深得路易士推崇，路易士《论诗之存在的理由》一文观点即来源于此。工藤将诗的世界定义为“理想的世界”，认为在那里，“一切无偶然、无异质物，无受外来的夹杂物妨碍事。”^[29]由这些论述可知，工藤注重诗的思想与情感统一的纯粹性以及不收任何外来干扰的独立性，路易士的诗学理论与此非常相似，这应当是他翻译工藤好美文论的主要原因。《诗领土》还刊有路易士翻译的诗论《饶舌之诗与沉默之诗》（第5期），作者荻原朔太郎是日本早期象征主义诗人，曾组织“以研究诗歌、宗教、音乐为目的”的人鱼诗社。《饶舌之诗与沉默之诗》与此前在《中华副刊》连载五期的《西洋诗与东洋诗》均译自荻原的著作《纯正诗论》。荻原认为：“诗在西洋是作为文学之理想的IDEA而受崇敬，诗人之文坛地位，在于远比小说家等为高的帝座。被称为‘诗人’的事情，在西洋是视作文学的名誉之最高的勋章。”^[30]这一认知深得独尊诗歌的路易士的认同。诗领土社成立后以诗歌研究为目的，路易士被时人称为“诗鱼”或“鱼诗人”，其诗作中也有关于“人鱼”的诗句，种种作为有向荻原致敬之意。

再次，撰文记述个人与日本文人的交往，甚至写诗传达情谊。路易士对与日本文人草野心平、朝岛雨之助、池田克己等人之间的交谊感到非常荣幸，并常常炫之于笔端。他对草叶心平的诗赞不绝口：“草野氏之诗风雄健而又优美，具可惊异的想像力，感觉的清新，表现的力强，及

其低徊的，小夜曲一般的，非常之抒情的调子，使我读之爱不释手。”^[31]在读草野心平的诗作之后亦曾做诗一首：“昨夜拜读了草野心平之《蛙》。/窗外蛙们夏夜之合唱是很抒情的。/游泳在非常之漂亮地印刷了的诗集之Page上，/那些活泼泼的铅字，恰似有生命的蝌蚪一般。/……/一只，二只，三只，……几十只，/几百只的蛙，扑通扑通地/跳入我的三十代的诗心之幽邃的古池了。”^[32]在朝岛雨之助离开上海的时期，路氏还写下《怀朝岛》的诗歌，并特别强调用中、日两种文字各作一首。^[33]在《题未定篇》（分载于《中华副刊》第360、361期）中，路易士则记述了1943年12月19日参加一个在“亚洲”咖啡店里的诗人茶话会的经过。茶会中，因日本诗人《向文学告别》而发笑，所以他特别在文中为诗辩护：“贫穷和流浪，社会的虐待和时代的迫害，这些乃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所必然要遭遇的命运。恕我坦白地说出来吧，我的诗，便是通过了这些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地狱而凝练和进化了的声音。”^[34]

《诗领土》创办后，路易士与在沪日人的互动多了一个重要平台。草野心平于1944年4月9日宴请诗领土同人，路易士、田尾、萧雯等出席，“晚饭前，大家坐在沙发上，一面少许喝着伏特加，一面以日语、英语和中国语交谈着关于诗、文学和艺术的谈话。路易士和草野心平都朗读了他们自己的作品，田尾和萧雯唱歌。直至夜深尽欢而散。”^[35]草野心平是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的同学，此时被聘为汪伪政府宣传部顾问，是在沪日本报刊《上海文学》《亚细亚》的创办者。从宴请当晚情况来看，路易士与草野心平已非泛泛之交，更像是知心诗友。《诗领土》

随后发布《亚细亚》即将创刊的消息，并列出了草野心平、岩井五郎、池田克己、黑木清次、朝岛雨之助等人名单，同时还发布草野心平第八至十本诗集《大白道》《关于中华民国的蓝》《南京五月花飘》即将出版的预告。《诗领土》与日本作家积极合作的姿态赢得了日本报刊的赞许，《大陆新报》称誉《诗领土》为“目前中国新诗运动之唯一的领导刊物”，《上海文学》《亚细亚》亦向《诗领土》伸来了“友谊之手”。^[36]而《诗领土》也投桃报李，打算陆续翻译《上海文学》同人梓云平、合肥庄平、朝岛雨之助作品，并以“本刊及《亚细亚》两诗志为中心”协力两国诗人。

若是在寻常年代，路易士的此种文学作为并无不妥，但在国土沦陷之时，他寻求与有占领者优越感的日本诗人合作，难免不被视为“亲日”“媚日”之举。

三、论争与批评：路易士的文学观

1944年3月，《诗领土》创刊号出版。创刊伊始，路易士就迫不及待地亮明自己的诗歌主张：“诗之存在的理由，在于其自身，而无关乎什么社会的需要，人生的需要”。^[37]路易士对于诗歌的独立性的坚守，与其三十年代的诗歌观念一脉相承，此时重申旨在建立理想中的“诗学时代”。《诗领土》第2期封面标注“纯诗与诗论月刊志”，宣示了《诗领土》的办刊定位，也表明路易士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办刊道路，他意欲借此建立一个独立的诗歌王国。在这里，他能团结“所有一切不甘妥协时流，不甘倾向低级趣味的纯文艺的人们”，建设一个致力于“诗精神的

昂扬、诗运动的兴起，以及纯文艺的新文坛。”^[38]为尽快张扬起自己的诗歌旗帜，路易士充分利用《诗领土》的社论和诗论，开展了几次论争与批评。

（一）关于“新诗的厄运”的论争。
《诗领土》创刊号上，路易士亲自撰写诗论《无诗学时代》一文，痛斥“这是一个乱杂的黑暗的无诗学时代”，原因是当下诗人不研究诗歌，不懂何谓“诗素”，他直言那些不懂诗歌的编辑“没有诗眼”。毫无疑问，以第一流诗人自居的路易士对新诗有着高度期许，因而他对一些刊物将“诗题与诗人的署名排得字体比小说与小说家的署名小”表示反感与抗议。^[39]路易士认为诗与散文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两者的出发点“是对蹇的两极的，犹黑与白，截然有别”。^[40]就像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将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一般，在路易士的文学观里，诗歌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从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到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其背后都有清晰的诗歌理论建构，承现代派诗歌余绪而来的路易士对此了然于心。他声称“原始的、单纯的、素朴的抒情诗人们的时代是过去了”，要做一个20世纪的新诗人首先就应该重视“诗学之根源的探讨”^[41]，这些主张表明了他想通过《诗领土》建构诗歌理论的决心。由是观之，路易士在文中强调诗论的写、译和读的必要性，都是应有之义。路易士建构诗学理论的热情可以理解，但他在亮明自己观点的时候过于急切，采取的是“关门主义”，几欲将其他文学门类和杂志编辑都打翻在地。

谭惟翰随后发表《新诗的厄运》一文，暗指正是路易士“不大高兴”给新诗“好颜色看”，才使得新诗“处处遭遇着

厄运”。^[42]并直言：“这是一个诗的时代！真正的诗人们知道怎样利用这个时代所赐予的血和力来凝成朵朵美丽而灿烂的诗花。”^[43]与路易士所谓的“这是一个乱杂的黑暗的无诗学时代”针锋相对。谭惟翰也承认诗与散文在本质上存在差异，但并不认为诗歌、散文、小说有高下之分。^[44]他也不认同路易士的“关门主义”态度，认为诗人生活在社群之中，摆脱不了人与人的关系，读者要求了解并欣赏诗歌是很自然的事，如果诗人写诗只为孤芳自赏，就没有刊印的必要了。显然，他对路易士动辄说杂志编辑“愚蠢”“没有诗眼”甚是不满。

谭惟翰与路易士的分歧还在于他们对诗艺的不同追求。路易士“提倡自由诗，反对格律至上主义”。^[45]谭惟翰则认为格律不能废除，他对青年读者“把新诗这玩意儿看得太容易”表示不满，认为“以破碎的散文来冒充充诗句”对诗“是一种污辱”。谭惟翰并不反对新诗在“语词、形式、或者比喻与组织”等方面“渗进新的成分”，但他认为不应该将诗写得“古怪离奇”让人看不懂，也不应该将诗写得“过于平淡显明”。^[46]路易士发表社论《何谓新诗的厄运》一文进行回应：一是指出“新诗的厄运”并非自己造成，认为谭惟翰无的放矢；二是批评谭惟翰以偏概全。^[47]岳家军则发表文章对谭惟翰的观点表示认同，认为要想“拯救新诗的厄运”，则需要“有天才、有修养、有决心”的诗人，而写作之人则应该拿出“应有的态度”：第一“不应该自负”，第二“要接受批评”。^[48]该文在表达自己诗歌观的同时，也有意规劝路易士放下唯我独尊的做派，接受建设性的意见。

这一场论争虽未产生太大反响，却也

并非“茶壶里的风波”，岳家军在南京刊物上发文，说明路谭二人之争已然逸出上海边界。路易士的回应文章短小简略，只亮出观点而缺乏深入严密的论证，几乎没有辩驳的力量，这大概也是论争未能继续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市侩文化”的论争。路易士将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杂志概括为两大类：一是报馆的官僚文化；二是消遣的市侩文化。他左右开弓，直言不讳地指出两者糟蹋了白报纸，压扁了文坛。因此，他号召：“纯文艺的同志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排击那些丑类，扫荡那些妖氛！”^[49]《诗领土》第2期，路易士发表社论《展开反官僚市侩文化运动》，重申上述论调，站在纯文艺的立场上向“官僚文化”和“市侩文化”宣战。这里的“官僚文化”指的是“公式化了的千篇一律的官僚八股”，而“市侩文化”则指“专供囤积货色投机炒股票的商人市侩们去消遣的通俗小说身边文学及其他低级趣味本位的出版物（主要以沉渣泛起的海淫海盗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50]路易士认为此时盛行的“官僚文化”和“市侩文化”假冒纯文艺之名企图鱼目混珠实乃罪大恶极，他希望小说（不是通俗故事）及其他文学放弃因销路或读者数多于诗歌而产生的优越感，共同向“官僚文化”和“市侩文化”宣战。^[51]

基于纯文学立场与精英文化意识，路易士极为厌恶鸳蝴派通俗文学，以至于随时随地都会涉及，《诗与小说》便是一例，该文本来是谈阅读叶山嘉树小说《往海洋去》之感受的，谈着谈着就借题发挥批判起鸳蝴派小说：“这正是一个投机市侩发横财的时代。发横财的人们，需要与彼等的身份程度相适应的文化。于是乎沉

渣泛起，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乘机抬头了。几百令几百令的白报纸被糟蹋着，在这个物资艰辛的战时下！黑暗！黑暗！黑暗！没有文化！”^[52]在谈论木偶剧时路易士也不忘施以冷箭，认为有些作家又走向张恨水等的路，实在是一大退步。^[53]在参加了南京举行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路易士执笔写下数点感想，尤可注意的是他对纯文学立场的强调以及对俗文学末路的诅咒：“第四，我坦白地承认，我不免也有一些违反了纯粹文学精神的浪费的写作，而那是在于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势之下所浪费了的。但这无损于我的‘完整性’。在我的正式的单行本里，我是不会把它们收入的。第五，今日之俗文坛既已达于‘强弩之末’，表面上的愈益繁荣，只不过是它的一种‘回光返照’而已，其最后之丧钟，正在由活泼新鲜有朝气的青年作家群，及埋头于纯粹文学作品之创造的作家们之手铿然击出，遐邇皆闻。”^[54]

相对于其他文人而言，路氏一方面愤怒于贫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非常明确地秉持精英立场，时时以社会文化责任的承担者自居，更不时强调为文学殉道的精神。^[55]关于他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蔑视，《文化汉奸罪恶史》有演义式的描写：

在林逆柏生某次招待当时所谓大东亚文艺作家的宴会上，诗鱼路易士突然起立发表演说，以震动屋瓦的呼号，猛烈抨击左倾的普罗文学，与堕落的鸳鸯蝴蝶牌，出席该会的平襟亚，也就不待席终，拂袖退席了。……当时编辑《万象》的陈蝶衣，也因名字致嫌，被指为蝴蝶一派，后来改名涤夷，不知道可是这原因？^[56]

此处文字或为戏说，但路易士对鸳鸯蝴蝶派不遗余力地攻击确是事实。鸳鸯蝴

蝶派作家多为才子，不擅论战，因而除了“拂袖退席”外，始终未见作出针对性的回应。

路易士的优越感和咄咄逼人的态度引起了北方文人的反感，严枢在北京刊物上发文，将路易士视为“疯狂了的领主”和“反动作家”，痛斥路易士“玩着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的把戏，在割据了一方‘领土’，而酋长似的自居为领主。他一个人在叫嚣，在骂不懂诗的‘俗物’是‘市侩’，他疯狂地叫着、喊着，玩着他的帽子、皮鞋、手杖、烟斗，像马戏班的小丑一样用啾呀的声调唱着他的‘黑暗、黑暗、黑暗’的诗，表演着他那丑的活剧。”该文对《诗领土》同人也表示了不屑，认为他们是“被俘虏的奴隶，被诱惑而落到陷阱里的野兽”，是投降《诗领土》的“亡命客”。严枢认为路易士乘人之危牺牲了许多无辜可爱青年的写作前途，“骑在他们的头上作大寨主。”^[57]该文通篇以丑化或漫画化路易士的形象为要旨，几乎没有太有力的论述。文风与路易士倒是很像，满纸的口号和标语。

(三)对左翼文学的批评。“反共、反左，保卫文艺自由，不许政治干涉文艺”，^[58]是路易士坚持一生的基本立场。因而批评左翼诗人对路易士来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一篇诗论或社论里都能看到他左翼诗人的彻底否定。在路易士眼里，左翼诗人提倡的“普罗诗歌”“国防诗歌”“大众诗歌”“抗战诗歌”“诗歌大众化”“新诗歌斯太哈诺夫运动”等口号“全是胡说八道。”^[59]左翼诗人“也许是革命家”，但绝非诗人与文学者。^[60]

路易士认为，虽然文学取材于现实，但现实并不等于诗，现实必须加以净化并经过组织与表现才能成为完整的艺术

品。因此，他反对左翼文学过分强调现实，呼吁《诗领土》同人清扫左翼残余分子的“现实即诗观现实即文学观之谬论”。^[61]他认为“普罗诗人”“大众诗人”对日常的一般经验表示好感就以为“把握现实”，无知而愚蠢。^[62]他对左翼诗人提倡“诗歌大众化”也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标语口号派、意识至上主义、诗歌大众化”均属于“谬论”，并非文学之一种，当在“文学之下”。他特地举出左翼大众诗人田间的诗句：“毛泽东/骑着马/来了”，指出这“实际上只是一句散文，毫无诗情诗意”，属于“伪自由诗”，是混在五四以来新诗里的“反动分子”，应当“抛到垃圾堆去”，“流放到‘散文’的沙漠地带去”。^[63]

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士所批评的文学标语化、口号化，并不仅仅针对左翼诗人，他对日本文学报国会文学视为宣传工具也表示坚决反对：“对于‘文学报国’这一立场，是无可反对的。而我所坚决反对着的，乃是在这旗帜之下的‘标语口号诗’，‘公式宣传文’之粗制滥造。”^[64]虽然路易士表明不反对“文学报国”，但他却指出“目前战时下的‘文学报国’，实际还不免是狭义上行为”，因为他“不认为在这旗帜以外的其他一切纯文学为不报国”。他甚至以波特莱尔为例举出反证，指出虽然波特莱尔连自己祖国的经纬度都不知道，但法国依旧以他为骄傲。基于此，他对“文学报国”的“狭义性”表示了担忧：“我希望大家能够超越了这个狭义的范围，不要太局限了。否则，芭蕉，芜村，陶渊明等东亚的而且是世界的大诗人的业绩就说不定有被否定掉了的危险。”^[65]作为一个与日方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中国诗人，路易士恐怕无意去

批评日本文学报国会文化政策的偏颇，他更想表达的是对政治操控文学的担忧。

就此而言，路易士并非一味谀言献媚、为虎作倀者，而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投机主义者，他在善加利用政治当局文艺政策的同时，也会坚持自己的文学判断与立场。事实上，除了生存问题之外，路易士更关心的是如何确立自己的诗坛地位，又如何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故而，无论是在文学论争还是在文学批评中，他都毫不掩饰自己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指点文坛的冲动，他的充满攻击性的言论充分展示了他睥睨群雄的自负。由于他对左翼文学的仇视与汪伪政权的反共立场毫无二致，所以他并不避讳《中华日报》的官方色彩，反

而有意借助其官方背景强化自己发声的权威性。对于路易士的文化认知，好友胡兰成评价倒是十分准确：“所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观念，责任或道德，理论或事实，他全不管。只是他认为对，他觉得有赞成或反对的需要，他就这么肯定了……社会不理他，不对他负一点责任，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对社会负责任，也是不可想象的。”^[66]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后期四大党（官）报文艺副刊整体性比较研究（1942-1945）》（项目编号：17BZW02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纪弦：《纪弦回忆录 第一部 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第127页。
- [2] 同注[1]，第120页。
- [3] 同注[1]，第120-121页。
- [4] 司马文贞：《文化汉奸罪恶史》第38页，见《民国史料丛刊 903 史地·历史》（张研、孙燕京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70页。
- [5] 同注[1]，第133页。
- [6] 同注[1]，第120-122页。
- [7] 路易士：《〈还乡诗钞〉后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68期，1942年10月14日。
- [8] 路易士：《〈滞沪诗钞〉题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 [9] 路易士：《归来吟》，《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 [10] 路易士：《〈滞沪诗钞〉题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 [11] 同注[1]，第122页。
- [12] 同注[1]，第122页。
- [13] 同注[1]，第121页。
- [14] 同注[1]，第132页。
- [15] 路易士：《关于〈向文学告别〉（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52期，1943年12月4日。
- [16] 史方平：《纪弦、路逾和路易士的汉奸活动》，引自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

史》，第188页。

- [17] 刘正忠：《艺术自主与民族大义——“纪弦为文化汉奸说”新探》，《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9 纪弦》（须文蔚编），台南：台湾文学馆2011年3月版，第296页。
- [18] 瘦秋：《苏北文化参访团扬纪》，《中华日报》1943年5月25日。
- [19] 路易士：《向文学告别（下）》，《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18期，1943年10月13日。
- [20] 路易士：《向文学告别（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17期，1943年10月12日。
- [21] 同注[19]。
- [22] 路易士：《关于〈向文学告别〉（中）》，《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53期，1943年12月5日。
- [23] 路易士：《关于〈向文学告别〉（中）》，《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53期，1943年12月5日。
- [24] 司马文侦：《文化汉奸罪恶史》，上海曙光出版社1945年版，第30页。
- [25] 同注[24]。
- [26] 路易士：《法国诗钞》，《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82期，1943年8月18日。
- [27] [日]大内隆雄作：《满洲文学》（路易士译），《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45期，1943年6月28日。
- [28] 工藤好美：《诗的世界》，《诗领土》第1期，1944年3月，第2页。
- [29] 同注[28]，第3页。
- [30] 荻原朔太郎：《西洋诗与东洋诗》，《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33期，1943年11月4日。
- [31] 路易士：《草野诗钞》，《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16期，1944年4月22日。
- [32] 路易士：《草野心平之〈蛙〉》，《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56期，1944年7月2日。
- [33] 路易士：《怀朝岛》，《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87期，1944年9月15日。
- [34] 路易士：《题未定篇 下》，《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61期，1943年12月22日。
- [35] 《诗坛消息》，《诗领土》第2期，1944年6月，第14页。
- [36] 路易士：《一面创造，一面战斗》，《诗领土》第3期，1944年6月，第1页。
- [37] 路易士：《论诗之存在的理由》，《诗领土》第1期，1944年3月，第15页。
- [38] 同注[36]。
- [39] 路易士：《反感与抗议》，《诗领土》第1期，1944年3月，封面。
- [40] 路易士：《无诗学时代》，《诗领土》第1期，1944年3月，第1页。
- [41] 同注[40]，第1页。
- [42] 谭惟翰：《新诗的厄运》，《杂志》1944年第1期，第4页。
- [43] 同注[42]，第7页。
- [44] 同注[42]，第5页。
- [45] 纪弦：《纪弦回忆录 第一部 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第132页。
- [46] 同注[42]，第4-7页。

- [47] 路易士：《何谓新诗的厄运》，《诗领土》第2期，1944年4月，第14页。
- [48] 岳家军：《怎样拯救新诗的厄运》，《作家》（南京）1944年第2期，第76-81页。
- [49] 路易士：《排击！扫荡！》，《新东方》第9卷第3期第31页，1944年3月15日。
- [50] 路易士：《展开反官僚市侩文化运动》，《诗领土》第2期，1944年4月，第1页。
- [51] 同注[50]，第2页。
- [52] 路易士：《诗与小说》，《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77期，1944年8月23日。
- [53] 路易士：《谈〈阿丽思的梦〉》，《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9期，1945年4月1日。
- [54] 路易士：《作家与文坛——南京归来乱弹》，《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12期，1944年11月18日。
- [55] 路易士：《杂论三题》，《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24期，1944年12月21日。
- [56] 司马文愷：《辱国的鱼路易士：跟了东洋诗人屁股后跑》，《文化汉奸罪恶史》第29-30页，见《民国史料丛刊 903 史地·历史》（张研、孙燕京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61-462页。
- [57] 严枢：《为解放“诗领土”而战——敬告疯狂了的“领主”路易士先生》，《青少年》第六卷第四期，1945年2月，第11页。
- [58] 纪弦：《纪弦回忆录 第一部 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第132页。
- [59] 路易士：《伪自由诗及其他反动分子之放逐》，《诗领土》第5期，1944年12月，第5页。
- [60] 路易士：《什么是全新的立场》，《诗领土》第5期，1944年12月，第5页。
- [61] 路易士：《谬论一扫》，《诗领土》第2期，1944年4月，第1页。
- [62] 路易士：《论诗之存在的理由》，《诗领土》第1期，1944年3月，第15页。
- [63] 路易士：《伪自由诗及其他反动分子之放逐》，《诗领土》第5期，1944年12月，第3-4页。
- [64] 同注[55]。
- [65] 同注[55]。
- [66] 胡兰成：《评路易士》，《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23期，1943年10月21日。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